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順县
凤栖寨調查报告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湖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

說 明

这份材料是1958年9月7日至10月14日調查的。参加調查的有施正一、胡克瑾、石建中、徐云龙、刘志述、韓恒煜、陈問丁等七位同志。

这次調查是着重解放后的变化发展情况的，其中尤以互助合作运动为重点，这是根据調查的目的与要求进行的，特此說明。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湖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

一九六四年二月八日

目 录

第一部分 概 况

第二部分 解放前的情况

甲、 关于经济方面.....	(3)
一、生产力情况.....	(3)
二、生产关系情况.....	(4)
乙、 关于政治方面.....	(10)
一、官、匪、霸三位一体的反动统治.....	(10)
二、保甲制度.....	(10)
丙、 在反动统治下土家族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在党的领导下土家族人民 英勇地进行了革命斗争.....	(13)

第三部分 解放后的情况

甲、 民主改革运动时期(1949—1952).....	(15)
一、建立政权、肃清残匪.....	(15)
二、土地改革.....	(16)
三、经济的恢复与农林业生产的发展.....	(17)
乙、 互助合作运动时期(1953—1957).....	(17)
一、互助组.....	(18)
二、初级社.....	(21)
三、高级社.....	(25)
丙、 大辩论、大跃进、公社化.....	(28)
一、大辩论.....	(28)
二、大跃进.....	(30)
三、公社化.....	(32)
丁、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	(33)
戊、党的领导与民族关系.....	(36)

第一部分 概 况

凤栖寨位于永顺县勺哈乡的西边，是一个土家族聚居的山寨，由禾作、中寨、屋吉、马龙庄等相距不远的四个自然村组成。全寨共有田五百零一点七三亩，土五十二亩，茶山三百亩，桐山二百五十亩（未包括荒山）。境内东南北三面高山环抱，形成天然屏障，主要山峰有天奶山和鸡公山。寨前是一小片肥沃的水田，田的外边是著名的猛洞河，水流急湍，清冽见底。凤栖寨依山傍水，山清水秀，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山寨。

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全年平均温度约在摄氏18度，最高摄氏32度，最低零下5度，年降雨量一千五百至二千公厘，适宜于各种农作物和桐茶林的生长。

交通尚称便利，沿猛洞河而下，五华里即可到达勺哈，勺哈是这一带的主要集镇。从勺哈沿永龙公路到永顺城，约二十华里，若搭乘从龙山开来的汽车，二十分钟即可抵县城。社与社，村与村之间，多田间小路或羊肠小道，来往运输均赖肩挑背背。猛洞河有舟楫之利，惜水急礁多，只能通行小木船，从凤栖运出粮、柴、桐油，从永顺城运回日用品。猛洞河还能用以水利灌溉及加工碾米，待发电站建成后，更能用以发电照明。

这里居住着土家和汉族两个民族。在全寨一百二十八户、五百零七人中，土家族占绝大多数，有一百二十五户、四百九十六人；汉族三户、十一人。据传说，土家族人民定居在这里已有悠久的历史。他们和附近的汉族以及你比、上基湖的苗族人民互相往来，相互通婚，在长期的劳动生产和共同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斗争中，结成了深厚的友谊。由于在生产上互相学习，生活上彼此影响，这种长期发展的结果，使土家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当地汉族基本趋于一致。

本寨的土家族人民由于长期与汉族人民交往，在民族特点和其他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衣着和当地汉人差不多是一样的，除本民族节日外，也过和汉族相同的新年、中秋、端午等年节。一般人都讲汉语，汉语已成为日常的交际工具。老人之间，在家里常用土家话交谈，中年人讲汉语也会土家话，青年人和小孩都讲汉语；而马龙庄地处高山僻壤，与外界接触较少，与下面几个村寨略有不同，讲土家话的较多些。

土家族人民是能歌善舞的。在劳动中或休息时，优美动人的山歌到处传扬，几乎人人会唱，山歌已成为他们在劳动和幸福生活中抒发热情的最普遍用的工具。

在大跃进的浪潮中，这里的土家族人民对旧有的习俗来了一个大革命，把有碍于生产发展的习俗一扫而光。过去凤栖寨的习惯是逢戊日不出工，十天一戊，再加上过年过节，一年有五十八天不出工，影响了生产。他们在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以后，天天出工，发挥了冲天的干劲，苦干实干，生产任务完成得更为出色。

土家族人民是富有革命斗争精神的。解放前，在官、霸、匪三位一体的反动统治下，在高租重税的压榨下，土家族人民过着“蕨巴野菜半年粮”的凄凉岁月。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各种疾病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健康。但是他们并没有屈服。在党的领导下，英勇地进行革命斗争，1934年10月间，贺龙、萧克两将军所率领的红军，击败

了国民党匪軍和伪保安团，进驻了永順。党立即领导了凤栖寨的土家族人民建立起苏維埃政权，組織游击队，打土豪劣种，把地主的財物分給农民，并且准备实现土地改革，在这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紅軍北上后，土家族人民时时刻刻怀念着党，怀念着紅軍，日日夜夜盼望着解放。

1949年8月27日是凤栖寨土家族人民新生的日子。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經過清匪反霸、土改等一系列民主改革运动，彻底摧毁了封建桎梏；1955年8月建立了初級农林生产合作社，1956年11月轉为高級社。1958年秋，凤栖寨人民积极报名参加了首車人民公社，与奇都湖、洞坎、哈家三个高級社組成一个生产大队。現在，凤栖寨的土家族人民正在社会主义建設大跃进的道路大踏步地前进！

第二部分 解放前的情况

甲 关于经济方面

一、生产力情况

凤栖寨是一个以农、林业生产为主的山区，农、林业各占一半。农业生产主要是稻谷、包谷、红苕、小米、豆类和棉花等；林业生产主要是经济林、桐林和茶林。勤劳的土家族人民，在平坝和层层叠叠的梯田上种植水稻，在峭陡的山坡上种植包谷、小米、红苕等杂粮，在高山上栽种桐、茶及各种树木。

农、林业生产是个体所有制的小农经济，以小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由于土家族人民勤劳，男女老少均参加劳动，男子多作犁田、耙田、打谷、插秧、挑运等劳动；妇女是生产中的能手，她们除了上山下田参加劳动生产外，还操持家务，抚儿育女，喂牛养猪，纺纱织布等，真是生产和家务样样都行；七、八岁的孩子以及老人也都参加劳动，上山打柴、割猪草、放牛、烧饭、挑水等，孩子从小就养成爱劳动的习惯。平日都是一家一户进行生产，至农忙季节也有变工互助的习惯，不计报酬。

解放前，土家族农民在农林业生产上所使用的生产工具，与附近的汉族农民大致一样，铁质农具很早就已普遍使用。生产工具主要有犁、耙、挖锄、薅锄、钉耙、镰刀、斧头、锯子等，生产设备有箩筐、扁担、晒垫、打谷桶、风车等，还有碾米用的水碾以及灌溉用的水车等。生产工具大都从汉区买来，由于山区岩山多，也有请本乡的铁匠打制适宜于山区使用的工具，铁原料则从龙家寨输入。

耕作技术，比较粗放，稻田一般是一犁一耙、二犁二耙，个别的到三犁三耙；包谷多是除一次草，也有少数除两次的。犁田多使用黄牛，水田犁深五寸，个别也有深到六、七寸的；旱地一般犁四、五寸深。在解放前，农历正月十五以后，才开始上山下田干活，生产季节与湘西各地大同小异。农历正月积肥，下肥薅草；三月种包谷；四月收小麦；四月中至五月初插秧；七、八月间开始收割稻谷，摘包谷；九月采桐、茶籽；秋后种小麦、油菜，犁水田。水稻一年一季，一般是先撒种于秧田，然后插秧，很少中耕，大部分稻田冬季休闲，少部分种植油菜、冬麦和菜蔬。此外，选种、播种、育苗、间种等也和附近汉族地区一样，稻谷、包谷都是稀苗大薅，稻谷播种直一点五尺宽一点二尺，包谷直二尺宽三尺，包谷土间或有轮歇三年五年不等。一般没有大量积肥的习惯，肥料以桐枯、茶枯、人畜粪肥及草木灰肥为主，一般只施肥一次，底肥下得很少。稻谷每亩施肥二百多斤，包谷三百斤，红苕六百斤。各种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稻谷每亩下种四至五斤，好田能收四百至五百斤，中等田二百至三百斤，下等田一百至一百五十斤；包谷每亩下种二至三斤，好土收三百斤，一般收二百斤，坏土只收一百斤左右；红苕每亩下种五十斤，最高收一千斤，最低收二百斤；麦子每亩下种六至七斤，最高收二百五十斤，最低一百多斤；一亩茶林可收二百至三百斤茶籽，一百斤茶籽可榨油七十

八斤，桐树产量也差不多。

水利灌溉多靠天然水源。解放前，根本谈不上什么水利设备，猛洞河虽然是一个很好的水源，但反动政府根本不关心人民的生活，不兴修水利，河水无法充分利用。甚至在夏季涨水时，河水淹没沿岸稻田。解放前十几年，有一次水灾，冲坏了四、五十亩稻田，减产五成。这里是旱灾严重的地区，解放前二十多年遭到一次严重的旱灾，光是中农向云蒸一家就减产七成；解放前十多年又遭到一次，光中寨一个村子，一百多亩田地就减产五成。

虫灾更为严重，多少年来这里是一个虫灾区，凤栖寨人民深受虫灾之苦，但无法防治，只有听其危害。有一年遭虫灾，禾作、中寨两处谷子减产二成，包谷只收到二成，损失颇大。那时人民采取迷信的办法，年年闹虫灾就年年玩“草龙灯”，求神保佑，而到收割时还是一场空。

湘西地区的土家族、苗族、汉族人民交错居住。凤栖寨及其附近的情况也是如此。由于长期共处，友好往来，在经济上、生活上互相交往，互相影响，关系密切。特别是土家族农民学习了汉族农民的先进的生产技术，更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就是在解放前，土家族地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当地汉族地区基本上一致。但是，在官、霸、匪重重统治和封建土地制度的剥削下，生活贫困，再加上天灾人祸，更谈不上改善耕作技术，因此生产发展受到束缚，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生产水平低下，贫苦农民一年要缺几个月粮，每年春夏荒成为凤栖寨土家族人民莫大的威胁。

凤栖寨的手工业有木匠、篾匠、皮匠、弹匠、裁缝、榨油、碾米等。这些手工业多为农民自身兼营，多数人还是以农业为主，手工业为辅，除裁缝、榨油、碾米外，劳作时间多在农闲或早春时节。

凤栖寨没有市集，进行交易要到附近各个定期集市，例如西来庄、莲蓬、岩板铺、皮家沟、龙家寨这些集市（当时勺哈尚未形成为主要集市），距凤栖寨少的也有十几里，多到三、五十里不等。一般是三天或五天甚至十天赶一次场，在赶场的日子，凤栖寨农民携带农产品到集市出售，再从那里买回农具、油盐等日用品。有时也到永顺城去赶集，主要是买卖牛猪。

解放前，由于地主阶级和奸商控制市场，操纵价格，压价收购土特产，高价出售日用品和工业品，土家族人民深受剥削。汉人小商贩也经常挑些日用品如洋火、剪刀、针线之类到凤栖寨来卖，虽有轻微的剥削，但也便于土家族人民。凤栖寨土家族人民没有专门从事商业的，但在农闲时有些农民挑桐油到湖北来凤或保靖、大庸、常德去卖，换些棉花、盐巴回来卖，获少量利润，以弥补生活的不足。

二、生产关系情况

1. 生产资料占有情况

土家族地区处于中国腹部的偏僻山区，帝国主义势力侵入比沿海地区较慢，自然经济的破坏也较慢较少，一直到解放前夕，在湘西地区，封建经济和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

关系仍然占着显著的优势。凤栖寨的土家族人民也深受残酷的封建剥削。

从土地占有情况来看：

解放前凤栖寨各阶层占有生产资料统计表

田土单位：亩

	户 数		田			土			桐 林			茶 林		
	实数	比 数	实数	每户平均	占总数 %	实数	每户平均	占总数 %	实数	每户平均	占总数 %	实数	每户平均	占总数 %
雇 农	13	11.02	6.45	0.49	1.5	6	0.46	7.7	86	6.61	4.59	30	2.30	6.51
贫 农	47	39.8	79.5	1.68	18.6	22.2	0.47	28.6	546	11.6	28.8	159	3.39	54.3
中 农	53	44.9	245.7	4.65	57.5	30.4	0.57	38.1	1,067	20.1	57.4	218.4	4.11	47.4
小土地租	1	0.88	8	8	1.8	3	3	3.8						
富 农	1	0.85	12	12	2.8	2	2	2.58	40	40	2.1	1	1	0.21
地 主	3	2.54	76	25.3	17.5	14	4.66	18.04	155	51.6	8.18	52	17.3	11.3
总 计	118		427.5				77.6		1,894			460.4		

地主不但占有一切质量较好的土地和桐茶林，并且还占有最主要的生产工具。从耕牛农具占有情况来看：

解放前凤栖寨各阶层耕牛农具占有情况统计表

	户 数		耕 牛 (头)			犁 (件)			耙 (件)			锄 (件)		
	实数	%	实数	平均每户	占总数 %	实数	平均每户	占总数 %	实数	平均每户	占总数 %	实数	平均每户	占总数 %
雇 农	13	11.02	0.5	0.038	1.35	0.25	0.018	0.175	0.25	0.018	0.5	11	0.846	4.83
贫 农	47	39.8	10.5	0.22	28.3	35.25	0.72	24.86	10.75	0.21	21.5	100	2.1	40.81
中 农	53	44.9	20	0.37	54.05	90	1.69	63.33	32.5	0.608	65	120	2.26	48.46
小土地租	1	0.88												
富 农	1	0.85	1	1	2.7	2	2	1.4	0.5	0.5	1	2	2	0.8
地 主	3	2.54	5	1.6	13.15	14	4.6	9.8	6	2	12	15	3	6.12
总 计	118		37			142			50			248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地主阶级霸占了大量的生产资料，在经济上处于绝对统治地位。而严重缺乏生产资料的广大贫苦农民则陷于被奴役和被宰割的境地。地主阶级是靠剥削起家、掠夺致富的，其所拥有这些生产资料和财富，都是从农民身上搜刮得来的。

首先，地主阶级利用反动的政治势力进行霸占与掠夺。例如富农向文生，就利用当

伪保长的反动权势，霸占了不少田地。田由八亩增加到十二亩，桐茶山增加到四十一亩。

其次，地主阶级又以高额地租和高利贷以及敲诈勒索等方式来并吞农民的土地。如地主向锡云，本来只有十多亩田，他依靠残酷地剥削雇工，强迫佃户服无偿劳役，又用鸦片、桐油、谷子等放高利贷。这样，使自己的田增加到二十六亩，桐山增加到一百多亩。有一户贫农，借了他的桐油，还不起债，他借此就吞并了这户贫农的一块五、六亩的桐山。

2. 阶级关系和剥削形式

①各阶级阶层情况

地主，有三户即丁福成、向锡云、向福堂，外寨地主在本寨有田地的一户（皮松青）地主的好田好土雇工耕种，路远质差的田土则出租。其详细情况见下表：

凤栖寨地主占有土地数量统计表

单位：亩

	田			土			桐 山			茶 山		
	雇工耕种	出租	小计	雇工耕种	出租	小计	雇工耕种	出租	小计	雇工耕种	出租	小计
丁福成	25	5	30	3		3	30	15	45	24		24
向锡云		20	20		6	6	10	20	30	8		8
向福堂	17	9	26		5	5	45	35	80	6	14	20
合 计	42	34	76	3	11	14	85	70	155	38	14	52

富农有一户（向文生），占有田十二亩，土二亩，桐茶山四十一亩，耕牛、农具都很齐全。他利用反动的伪保甲长、伪自卫队长的权势，强迫贫雇农民给他作无偿劳动，雇短工也只给一半工资，加上高利贷剥削，田地陆续增加，过着接近于地主阶级的生活。

小土地出租者一户，占有田八亩、土三亩，雇长工耕种，每年还雇短工干活，共约二百多个工，并放高利贷，生活过得较好，一般很少吃杂粮，衣服、家具也很齐全。

中农共五十三户，占总户数的44.9%，本寨中农一般占田四、五亩到10多亩，大都是中等田，人口多的有时要佃种地主的田地。中农自己占有生产资料，有田地，耕牛农具够用，受地主阶级剥削较少，可以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遇到抓丁、派款、土匪抢劫或年成不好，中农就借债或当田卖田，生活日益下降，一部分尚能勉强维持温饱，另一部分则下降为贫雇农。如沦为贫农的有丁先彬、向有银、向文玉、向家信、丁超珍、向进修，沦为雇农的有丁超群、向万春。他们直到解放前夕，都没有翻身。

贫农共四十七户，为总户数的39.8%，有田七十九点五亩，为总田数的18.6%；有土二十二点二亩，为总土数的28.6%。贫农生产资料很少，农具耕牛更为缺乏，多靠借用或以换工方式交换使用，一年有大半年靠出卖劳动力为生，也租种地主的土地，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加上高利贷、抓丁、苛捐杂税，终年过着贫困悲惨的生活。

雇农共十三戶，占总戶数的11.02%，他們占有极少量的土地，耕牛更少，十三戶人家只有半头牛，并且只有鋤头、砍刀等简单的工具和一双劳动的手，他們专靠做长工或打零工过活，在旧社会的农村里，他們的劳动是最繁重的，而他們的生活則是最贫穷和最悲惨的！

②剝削形式

地主阶级利用掠夺和剝削得来的生产資料，进一步变本加厉地剝削农民，其手段是残酷毒辣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地租剝削：地主阶级对农民进行剝削的主要手段之一。在凤栖寨，地租形式主要表现为实物地租，并附之以劳役。

租額是按田、土、桐、茶山的不同情况而不等：

田：	上中等田	下差田
	地主与佃戶作6/4分	5/5分
土：	中上土	次下田
	地主与佃戶作5/5分	4/6分

更坏的土，不定租額比例，由佃戶与地主双方議。此地称之为“課”。估計亩产約一百八十斤的包谷与豆子（二者間种）交給地主“課”約五十斤包谷和十五斤豆子。

桐山：收的桐籽，地主与佃戶作对半分。地主向福堂的桐山是三七分（地主得七成）。桐山間种的杂粮归佃戶。

茶山：收的茶籽也作对半分，茶山間种的紅苕必須“送”給地主五十至一百斤。地主向福堂的佃戶要把茶籽全部交給地主，杂粮則全部归佃戶。

农民租种地主的田地，有一定的租佃手續。若地主和佃戶双方都是本寨的，可以不經介紹，双方直接交涉租佃問題；若有一方是外寨的則要通过介紹人。租額由地主定，不論年成好坏，这种比例不变，有时甚至达三七分（地主得七成）。凤栖寨的三戶地主，出租土地一百三十九亩，占他們所占有的总土地数的52%，每年靠实物地租剝削农民的劳动血汗，約計稻谷一万零二百斤（以平均亩产三百斤計算），包谷二千二百斤（以平均亩产二百斤計算），桐茶尚未計算在內。議租不写契約，也沒有押租金，只有“課”才写一个簡單的契約。一般，地主不提出退佃时，秋后，农民仍照旧种下去；若地主不满意佃戶时，便提出夺佃，再轉租給別人。如果原佃戶已經在租入的田土上花了劳动，下了种子，則由新佃戶补偿种子，地主随意补给原佃戶少量工錢（小工、牛工），大約一天补给半升米口粮和工資（相当于現在的一角錢左右）。

农民不仅要繳納高额的实物地租，并且还要受地主的变相的剝削。每年收割之前，就得通知地主来收租，佃戶要杀鸡、备酒飯請地主吃，临走时还要送活鸡和腊肉，否則，地主将会夺田。佃戶采药、打猎、捕魚有了收获，也必須“送”地主一份。地主在收租时，不仅要收谷子、包谷，凡是地主地界上种的什么，长的什么，地主就要分什么。总之，样样都有租，样样都得分，如桐籽、茶籽、黃豆等等，沒有一样能逃脫地主的魔掌。交了租以后，貧苦农民只剩下几个月的口粮，辛苦一年劳动血汗所得，大部分为地主掠夺搜刮殆尽。

无偿劳役也是地主剥削农民的一种重要手段，并且是一种更变本加厉的勒索。农民不仅要缴纳实物地租，还要负担沉重的无偿劳役。租种了地主的田地，就要服从地主的支配，必须随叫随到，甚至在农忙时也不能例外。如果地主叫了几次不去，地主就要夺佃。农民为地主作无偿劳役是没有任何报酬的。地主派在农民身上的劳役愈多，地主就愈来愈富，而贫苦农民被沉重的无偿劳役压得愈来愈穷，无偿劳役成为地主扼杀农民的一条绞索。如地主、伪保长陈世文，利用反动权势，强迫农民服无偿劳役，强迫农民为他耕种田地，不给工资，还要自带伙食。他修新屋子，除木匠有工资外，其他一切杂工都是强迫农民服无偿劳动。其他一切轻重杂役，如抬轿、打柴、碾米、跑腿、婚丧事等，都是任意使唤农民来负担。

雇工剥削：也是地主的主要的剥削手段之一。贫苦农民在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下，日益贫困，纷纷破产，破了产的农民，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给地主干活，地主就乘机雇用大批的廉价劳动力，并迫使农民接受各种苛刻的剥削条件。雇工有长工、月工、日工等。

三户地主，雇工耕种田土一百二十九亩，占所占有的总田土数的48%，户户都有雇工剥削。三户地主中，有两户雇长工各一人，三户都雇月工，日工则每年共约六百六十个工。

地 主 雇 工 数 量 表

户 名	雇 长 工 数	雇 月 工 数	雇 日 工 数	支 倒 工
丁 隔 成	1	2	280	无 定 数
向 锡 云		1	180	"
向 福 堂	1	2	200	"
共 计	2	5	660	

长工工资极低，一年约三十五至五十元，也有用粮食支付的，约一石米（二百八十斤）。如地主向福堂就用粮食支付工资。地主管长工吃饭，每日三餐，吃的是杂粮、酸菜。地主向福堂甚至只给长工吃酸汤，逢年过节才给长工一点肉吃，装装“慈善”门面。

守牛儿大都是十几岁的贫雇农子弟，给地主放牛，没有工资，地主只给饭吃，一年给一、二套衣服。

月工，地主在农忙时雇用月工，按月计算，有的雇一个月，有的二、三个月，时间不等，按月给工资，一个月约四至五元，工资比长工略为高些。

日工，按日计工，一个工一升米（不吃地主的饭），歉收年一个工一升包谷（一升等二市斤十二两）；在地主家吃饭的一个工只给半升米或包谷。

“支倒工”（即以工抵债）的剥削手段更为毒辣。在青黄不接时，农民向地主借粮，地主要他们以劳役偿还，劳役时间不定，随叫必须随到，即使农忙时也必须放下自家的

农活，服从地主的使唤。做一天工只给一半工资，有时是白做。这种剥削非常残酷，一般贫苦农民能够想办法的，都尽量不支倒工。凤栖寨的贫雇农每年大约有十五户受到这种残酷的剥削。雇农丁远发借了地主丁福成一百斤桐油，结果做了两年长工，才还清欠债。贫农王正云借地主丁福成五升米，农忙时被喊去做工，自己的包谷土没法种，只得任其荒蕪。

雇工整日劳动，工作繁重劳累。长工每天黎明即开始工作，挑水、背柴、挑粪，修整田坎，早饭后直到晚饭时，做庄稼活，晚上还要为地主打杂，一天工作在十三、四小时以上。除农忙时地主雇月工、短工外，一个长工一年要做三十亩田的庄稼活。一年四季，没有一天休息，就是逢“戊”日（按传统习惯不能动土），其他的杂事还得要干。长工和月工的工资大都是支钱。解放前，物价不稳定，币制贬值，他们的实际收入和他们所得的工资之间有很大距离。有一个长工，一年到头辛勤克俭，到第二年支出工资，什么东西也买不上了。家里有负担的长工，平日陆续支出一些工资，到年底结算，有时反而倒欠地主的钱。雇工整年劳动，创造出来的劳动果实，养活了地主，自己反而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这种极不合理的封建剥削制度，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他们的劳动情绪反映在这样的歌谣中：

“长工只望把年过，
短工只望日头落。”

高利贷剥削：地主除以地租、雇工等形式对农民进行剥削外，还兼放高利贷。高利贷是形形色色的，有放款、放谷、放桐油、鸦片等。利率一般是“钱三货五”，借钱到期还30%的利息，实物还50%。解放前早已通行“加十”的利，称之为“对滚利”，就是加利到100%。

借银元利息更高。永顺县城的地主，商人通行“大加一”借十块大洋，一年光利息就要付十二元，本利一共二十二元。凤栖寨土家族贫苦农民就受过这种高利盘剥的痛苦。

放谷子多在每年青黄不接的季节（农历2—3月间与5—6月间），借谷子是一百斤还二百斤，利息高达100%。

贷放桐油，一般的利息是50%或60%，一百斤桐油还一百五十斤或一百六十斤。

凤栖寨三户地主都放高利贷。地主向锡云放桐油，放谷，利息大利100%或120%，小利50%，并开设烟馆，除卖鸦片烟，引诱贫雇农去吸食，第二年就以工抵债。地主丁福成放债最多，放谷是100%的利息，放桐油是50%或60%的利息。

高利贷的盘剥，给农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贫农向万钟，因孩子多，收入少，向地主向锡云借贷，为了还债，把二十四挑田卖掉二十挑，并给地主做倒工（以工抵债），直到解放时，债务尚未还清。高利贷的残酷剥削，迫使农民出卖田地，倾家荡产。凤栖寨流行的谚语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问题：“田地不下仔，年年有人卖”。一般人能够少向地主借债的，都咬紧牙关少借债，但这种人很少；全寨不过十来户人家，即使他们借债少，但仍未逃脱债主的魔掌。贫农王正云借了地主丁福成五升米，农忙时也得丢下自己的农活去为地主做工。贫雇农为了生活，不得不向地主借债，可是样样利息都高，贫苦

农民債台高筑，愈陷愈深，生活更加貧困。解放前本寨因受高利貸剝削而淪为乞丐的有五、六家。即使中农也有因負債而生活下降的，有五戶下降为貧农，兩戶下降为雇农。高利貸剝削使地主階級愈来愈富。地主丁福成就是放高利貸而发家，由富农上升为地主；地主向錫云放高利貸，田地由十多亩增加到二十六亩；永順县城的地主皮松青也因在本寨放債，吞沒了农民的田地約六亩左右。高利貸的剝削加速了农村的破产和两极分化。

乙 关于政治方面

一、官、匪、霸三位一体的反动統治

紅軍北上后，国民党的反动統治，地主恶霸的封建掠夺，土匪的搶劫騷扰，在湘西实际上已互通一气，构成一体。这种“三位一体”的形成是由于他們三者之間階級利益的一致性。民国初年，軍閥长期混战，在湘西遺弃的枪枝很多，給地主、土匪的割据称霸提供了有利条件。湘西历来土匪猖獗，許多土匪都是代代为匪，輩輩相传，以后国民党反动政府便利用这些地方土匪作为統治湘西的工具，实行豢匪养匪，許多匪首被封官；以后土匪更依賴反动政府的庇护，搜刮田地，掠夺民財，成为大地主。1927—1935年階級斗争极为尖銳的时期，这三种反动势力更进一步勾結起来；紅軍走后，更表現了三者反动統治的一致性，在湘西变成了反动官僚，地主恶霸和土匪的天下，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統治。

無論整个湘西或土家族地区，90%以上的恶霸都是匪首或慣匪，大多数地主与土匪都直接勾結或間接的联系，当地流行这样的話：“有枪就有势，有势就有官”，他們搶劫掠夺，无恶不作。土匪掠夺时，地主不但不会遭到損失，搶劫的財物反而送上地主家門，而地主的指引往往成为土匪活动的綫索。

凤栖寨土家族人民也受尽了官、霸、匪三位一体的統治和剝削。

陈世文是凤栖寨的“三位一体”反动統治的代表人物。他是恶霸地主、土匪，又是伪保长，在政治上、經濟上残酷地統治压迫广大貧苦农民，从1934—1940年連續任伪保长期間，霸占田土二十三亩，桐山五十亩，茶山十亩，并强迫貧雇农为他服无偿劳役。他勾結岩門土匪搶劫七都湖的染行，从中分脏；并勾結勾哈大土匪朱德明經常搶劫勒索，借口抓丁，把中农向生松的耕牛搶走。在紅軍北上时，残害革命干部陈唐氏，逼得她丈夫神經失常，流落他乡，靠行乞渡日。当地土家族人民对他恨之入骨。

向文生也是本寨“三位一体”的代表人物（富农、伪自卫队长，又是伪保长）。他利用反动政治势力，勾結勾哈乡土匪六人，搶劫本寨向先金家（小土地出租者），把向先金綁走，勒索一百一十元。他看中农民丁先緒的四亩多水田，欲强买，丁不同意，后来借口丁欠他的債未还清，把田地强夺去。

二、保甲制度

国民党反动政府推行的保甲制度，成为官、霸、匪三位一体对凤栖寨土家族人民进行反动統治的最残酷的制度。

1. 利用保甲制度抓丁派差。国民党反动派指使伪保甲长到处抓丁，而伪保甲长则从中牟利，残害人民。贫苦农民受害最深。平日生活贫困，入不敷出，遇到抓丁，无钱送伪保甲长，只得被抓走。有时也卖田、借债去抵丁买兵，但今年缴免，明年又会轮到，年复一年，田地卖光，债台高筑，利上滚利，还也还不清，最后还是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如贫农向文生，有三弟兄，头年春天抓丁，借了三百斤桐油送给伪保长陈世文，才免抽。冬天又来抓丁，家里没钱，只好把弟弟向生治送去。后来奔走告贷并变卖了家中一切能卖钱的东西，把人赎回来。人虽回来，但家中一贫如洗，生活更加贫困。又如向万春有三个儿子，1947年大儿被抽去当了，从此杳无音讯，不久二儿又被抽去，若不是解放，那么三儿也难逃过伪保甲长的魔掌。

派差，也多半派到贫雇农头上。一年做多少差是没有定量的，在服差期间也还受尽勒索和压诈。1942年，本寨派出五个人去淑浦修飞机场，黑心的监工吞没了他们的伙食钱，又把他們卖给别县做民工，他們聞訊逃跑，没钱吃饭，只好沿途求乞，到家时已饿得半死。服差役连十几岁的孩子也不能缴免，修飞机场的五个民工中就有一个是十五岁的孩子。

2. 伪保甲长并通过苛捐杂税来敲詐勒索，搜刮人民血汗。苛捐杂税是贫苦农民的沉重负担，一个农民每年负担的数目，一般占总收入的30%以上。苛捐杂税的名目不下五、六十种。下面列举几种主要的：

月款、月米：根据每户所占田地数，按月出一元或几角不等，或每月出二、三升米，名义是养兵，实际上被伪保长从中吞没。

鸦片税：抽税标准由伪保长等人任意规定，上缴时又从中吞没一部分。

枪枝捐：借口防匪，强迫每户出款，购买了四枝枪，由于陈世文、向文生本身就是土匪，枪枝不但未起到防匪自卫的作用，反而被土匪利用来欺詐农民。

草鞋钱：伪保甲长到农民家去催粮，先索取草鞋钱三、四元不等，还要农民备酒肉招待。

招待费：伪县政府官吏下乡，伪乡政府請客招待之款就派到农民头上。如招待费用去一百元，乡里派下来时說成一百五十元，分摊到各保各甲，伪保甲长又私自增加款数。伪乡长、保长、甲长层层从中吞没，倒霉的还是农民。

采买谷：勺哈乡伪团长、土匪头子朱德明，经常派人到凤栖寨来要谷子，名曰采买谷。有谷子的要派，没有谷子的也要派，有二十几挑谷子就派一挑（一挑约等于一百斤）。1944年向文生任伪保长时，派向文友（中农）一百斤采买谷，向文友交不起，被吊在梁上毒打一頓，最后还是借了桐油送去。

壮丁款：一个壮丁要出四、五百斤桐油。

伪保长陈世文、向文生等人将搜刮来的人民血汗钱，在賭场上揮霍、賭博、吃喝玩乐。

3. 强种鸦片

国民党統治时期，湘西有“三多”，即“土匪多、山多、鸦片多”。鸦片的种植与买卖成为官、霸、匪发财致富的重要手段之一。陈渠珍統治湘西地区时，就强令各地种

植鴉片，鳳栖寨几乎家家户户都种，全寨种植面积五十多亩，占田亩总面积的11.7%（总田亩数四百二十七点五亩）。强种鴉片，影响了农业生产。

鴉片成熟后，伪保甲长就来抽税，按烟的质量，甲等抽50%至60%，乙等抽30%至35%，丙等抽20%，丁等抽15%。地主和伪保长又来强买，每两收价只值六、七升米，以后他们再出卖，一两就要值一斗米，甚至二、三斗米，暴利几倍以上。

反动统治者不但强迫人民种鴉片，并用鴉片来毒害人民。解放前，大约前后有五十年的时间，凤栖寨开设过三个烟馆，抽烟的人达全寨人口的50%左右。地主向锡云开设的烟馆，剥削手段极为毒辣，引诱贫雇农抽烟，可以除帐，第二年就以工抵债。贫农向生文在向锡云的烟馆除帐抽大烟，做工来抵债，债愈欠愈多，最后聊倒，死在油坊里。贫农向万春除帐抽大烟，欠地主向锡云十五元，几年后，仅有的三亩田都因抵债而被地主霸占去。

鴉片对凤栖寨人民的危害极深，对社会经济和人民的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影响，这是“三位一体”反动统治的恶劣后果。

丙、在反动统治下土家族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在党的领导下土家族人民英勇地进行了革命斗争。

解放前，在官、霸、匪三位一体的残暴统治与剥削下，农村破产，生产力低下，凤栖寨广大贫苦农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这里流行的一首旧山歌，正是过去那种痛苦生活的写照：

正月里来过新年，	处处炮竹响连天，
地主富农吃酒肉，	我们没米又没盐。

二月里来二月八，	拉钱借米包田挖，
山芋野菜掺稀饭，	烦疼儿来儿叫妈。

三月里来三月三，	挑柴割草爬高山，
卖柴一日望到晚，	竹筒白米红土掺。

四月里来撒秧迟，	没有吃的吃种根，
吃了种根借种根，	提着籬筐泪汪汪。

五月里来忙栽秧，	水到田地心里慌，
为了吃的把工卖，	别家栽满自家荒。

六月里来炎夏天，	秧起节把秧下田，
五荒六月拉大痢，	眼泪颗颗落入田。

七月里来七月七，	天上牛郎会织女，
我们夫妻两头散，	男奔东来女奔西。

八月中秋月亮圓，	地富月餅吃得甜，
農民吃的是苦水，	望望月亮奔西天。
九月里來忙收割，	場上人比谷子多，
算盤一响心頭冷，	鏈枷頭上就換鎖。
十月里來刮冷風，	鋼絲被窩過寒冬，
圈起腳杆震衣窄，	伸直腳杆上下空。
多月里來雪花飄，	雪花飄飄一把刀，
刀刀刺在心痛處，	牛馬日子難得熬。
臘月里來一年滿，	指望來年有吃穿，
年輕几郎望到老，	輩輩眼睛都望穿。
天上星星撒滿天，	我們苦水吐不完，
不怪天來不怪地，	地主富農打算盤。

地主階級凭借着占有大量的生產資料，貪婪地吮吸着勞動人民的血汗，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而广大劳动人民創造的財富，被地主階級搜刮殆盡，自己都过着半年蕨芭半年糧的悲慘生活。封建土地所有制嚴重地束縛了農民的生計積極性，他們沒有興趣來改進生產技術，因此生產水平發展緩慢，生活水平愈來愈低，貧苦農民一年至少缺3—6個月的食糧，有時連鹽巴都吃不上，遇有災荒歉收，更以蕨根、蕨巴、蒿草充飢。他們穿着襤褸，衣不蔽體，不少人穿不上棉衣，一戶人家能有一、二床破棉絮，就已經是很好的了。在惡劣的生活環境中，疾病流行，但窮人生了病無錢醫，只有祈求“土王”保佑，嬰兒死亡率較高，如貧農向景達的三個孩子，都因為沒錢醫治而病死，他的愛人傷心得哭瞎了雙眼。在這樣的生活條件下，貧苦農民的子弟是沒有上學的權利的，全寨90%以上的人民處於文盲狀態。

在這種牛馬不如的生活里，國民黨反動派還要抓丁派差，名義上是“二丁抽一，三丁抽二”，實際上是無錢可以買人頂替，無錢則被抽走，去了絕少有生還的，弄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鳳栖寨一個農民王官銀被抽去當丁以後，音訊全無，妻子改嫁，家庭就此破壞了。馬龍莊的農民王長生，原有稻田二十挑（約五挑等於一畝），被地主逼債賣去十三挑，後來因眼病喪失勞動力，被迫靠行乞渡日。鳳栖寨有七戶中農，本來生活能勉強維持，由於應付各種苛捐雜稅，加上天災人禍，生活愈來愈貧困，有五戶淪為貧農，二戶淪為雇農，而貧雇農在這種情況下破產而淪為乞丐的有五、六戶。

土匪還到處搶劫，綁人，搶衣物、錢財、耕牛等，農民上山躲匪，日夜住在山洞里，田園荒蕪，生活益加貧困。

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鳳栖寨土家族人民雖然遭受到百般殘害，过着极其悲慘的生活，但是受過革命洗禮的土家族人民爭取解放的意志是堅不可摧的。

1934年10月初，賀龙、蕭克兩將軍所率領的紅軍，打敗了國民黨偽保安團，進駐了永順縣。在黨的領導下，在鳳栖寨成立了蘇維埃鄉政府，設主席、土地委員、肅反委員等人，土家族王長壽、向文金、丁時金、陳唐氏等在蘇維埃鄉政府里擔任了工作，發動群眾，積極地進行了打土豪、分地主財物的鬥爭，並着手準備進行土地改革；又成立了游擊隊配合紅軍作戰，土家族青年在黨和紅軍宣傳教育和實際行動的影響下，有四十多人參加了游擊隊。1935年11月紅軍北上抗日，鳳栖寨有十幾個青年隨同紅軍一道長征，他們深深懂得，只有打敗日本帝國主義，解放全中國，才能求得徹底的翻身。

紅軍暫時離開了，但革命的種子已經深深地種在土家族人民的心頭，他們堅信紅軍一定會再回來。在紅軍北上後，反動勢力卷土重來，永順城里大屠殺三天三夜；鳳栖鄉蘇維埃政府的婦女委員陳唐氏、肅反委員胡興仁及參加紅軍的向萬珍，被反動地主殘加殺害，令人慘不忍睹；惡霸地主又進行倒算，奪回被分東西，搶走農民王長壽的耕牛。

但是，多苦多難的生活並沒有動搖鳳栖寨土家族人民的革命意志。在紅軍走後的十多年中，他們時時刻刻懷念着黨，懷念着紅軍，日日夜夜盼望着解放，他們期待着革命風暴的到來，他們迫不及待地要求推翻反動統治，要求建立起代表勞動人民利益的新政權。